

毛泽东同志
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中国人民
解放军 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编印

毛泽东同志
論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

(供本院教学用)

中國人民
解放軍政治學院訓練部圖書資料館編印

一九六〇年三月

說 明

为了認真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我們將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等問題的論述汇集在这个文件中，供同志們学习。

本書按問題性質編排，並加标题。由于我們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还非常不夠，加以時間仓促，在分类与标题方面，均会有不当之处，选录內容亦可能有遺漏；請同志們幫助指正。

目 錄

(一)关于羣众路綫問題	(1)
— 加强羣众观点。为人民服务	(1)
— 党的一切事业，都要依靠与发动羣众	(11)
— 正确对待羣众运动	(18)
— 关于羣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問題	(25)
(二)关于理論联系实际問題	(42)
— 理論来源于实践。革命的理論是 行动的指南	(42)
— 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經驗主义	(55)
— 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	(69)
(三)关于批評和自我批評問題	(77)
(四)关于团结問題	(83)
(五)关于民主作风問題	(92)
(六)关于学习問題	(104)
(七)关于勤儉办一切事业問題	(113)

(一) 关于羣众路綫問題

加强羣衆觀點。爲人民服務

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須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苏维埃具有绝大的力量，他已经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而且也是羣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力量的伟大，是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所不能比拟的。但他的力量完全依靠于民众，他不能够一刻离开民众。

摘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蘇維埃中國”。1957年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翻印本259頁。

(十)要加強羣众运动。所謂准备羣众即指此。……羣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摘自：“反投降提綱”，23頁。1939年6月(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羣众生产，羣众利益，羣众經驗，羣众情緒，这些都是領導干部們应时刻注意的。

摘自毛主席爲中直軍直生產展覽會題詞。1943年11月24日解放日報。

十五个月抗战又证明了民众援助抗战力量之伟大；同时也证明了民众力量之仅在开始发动，因而使抗战得不到民众的广大援助而遭受了许多挫折。从此得到教训，国人必须进一步的認識抗战依靠民众的这个基本問題。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中国今后的进步，还必须充分表现在发动民众力量这一方面。

摘自“論新階段”。1938年7月12日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

我們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

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摘自“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毛泽东选集”三卷，1061——1120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摘自“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毛泽东选集”

三卷1003页。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1945年的任务” 转载自田家英：“学习为人民服务”，

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24页。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的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的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只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作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能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

根本政策，每个同志……都要好好去研究。

“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轉摘自田家英：“學習爲人民服務”。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24——25頁。

想問題从羣众出发而又以羣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能办好。

“論合作社”轉摘自田家英：“學習爲人民服務”。人民出版社在1953年版，28頁。

共產黨員在民衆运动中，應該是民衆的朋友，而不是民衆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摘自“論新階段”。1938年7月12日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爲中國人民服務，在現時，爲着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在將來，爲着團結全國人民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政策，只要我們一致努力，我們的任務是必能完成的。

摘自“兩個中國之命運”，1945年4月23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028頁。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羣众生活的問題。

我們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動員廣大羣众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誰要是看輕了這個中心任务，誰就不是一個

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員。我們的同志如果把這個中心任務真正看清楚了，懂得無論如何要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那末，我們對於廣大羣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羣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因為革命戰爭是羣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羣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羣眾才能進行戰爭。

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當然不能。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鬥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羣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羣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羣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羣眾生活的組織者，羣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同志們，那時候，我們號召羣眾參加革命戰爭，能夠不能夠呢？能夠的，完全能夠的。

在我們的工作人員中，曾經看見這樣的情形。他們只講擴大紅軍，擴充運輸隊，收土地稅，推銷公債，其他事情呢，不講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個時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對於羣眾生活問題一點不理。汀州市羣眾的問題是沒有柴燒，資本家把鹽藏起來沒有鹽買，有些羣眾沒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價又貴。這些是汀州市人民羣眾的實際問題，十分盼望我們幫助他們去解決。但是汀州市政府一點也不討論。所以，那時，汀州市工農代表會議改選了以後，一百多個代表，因為幾次會都只討論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完全不理羣眾生活，後來就不高興到會了，會議也召集不成了。擴大紅軍、動員運輸隊呢，因此也就極少成績。這是一種情形。

同志們，送給你們的兩個模範鄉的小冊子，你們大概看到

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岡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岡乡青年壮年男女百个人中有八十一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岡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四千五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岡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路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岡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岡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模的长岡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岡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

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羣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羣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羣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鬥。這是無疑的，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不是實實在在地被我們粉碎了么？

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筑其烏龜壳，以為這是他們的銅牆鐵壁。同志們，這果然是銅牆鐵壁么？一點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么？羣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俄國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惡的一個統治者；當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起來的時候，那個皇帝還有沒有呢？沒有了。銅牆鐵壁呢？倒掉了。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羣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羣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羣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

摘自“關心羣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一卷，131頁。

既然必須和新的羣眾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和羣眾的關係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凶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

……中國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

•••

必須到羣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羣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里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摘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23日，

“毛澤東選集”三卷，862頁、878頁。

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的熱忱，必須聯繫羣眾，而不要脫離羣眾。要聯繫羣眾就要按照羣眾的需要和自願。一切為羣眾的工作都要從羣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有許多時候，羣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羣眾還沒有決心，還不願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羣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願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羣眾。凡是需要羣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羣眾的自覺和自願就會流於徒有形式而失敗。“欲速則不達”，這不是說不要速，而是說不要犯盲動主義，盲動主義是必然要失敗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羣眾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這裡是兩條原則：一條是羣眾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裡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羣眾的自願，由羣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羣眾下決心。

摘自“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1944年4月30日，

“毛澤東選集”三卷，1009頁。

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羣眾相

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羣眾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羣眾鬥爭的大世面。“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羣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羣眾中間去，向羣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羣眾（宣傳），並號召羣眾實行起來，解決羣眾的問題，使羣眾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羣眾，不了解羣眾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羣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羣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我覺得，在無論那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分缺乏羣眾觀點因而脫離羣眾的工作同志。我們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羣眾親密地結合起來。

摘自“組織起來”，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936頁。

這裡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於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

千万不要忘記这一点。

摘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1957年6月。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24頁。

我們应当相信羣眾，我們应当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摘自“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匯編”第一編(下)，582頁。

黨的一切事業，都要依靠與發動羣眾。

什么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單單說明目的還不夠，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就是說，要有一個政治綱領。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又有了“抗戰建國綱領”，應把它們普及於軍隊和人民，並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現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有的一些，滄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眾口味，神氣和民眾隔膜，必須切實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動員就夠了，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聽，這樣的背誦是沒有人聽的；要聯繫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繫士兵

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摘自“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二卷，
470页——471页。

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量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一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摘自“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
二卷，501页。

说到教训，那也是很大的。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

国性的，参战的成份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能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从参战的成份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摘自“和英国记者贝特森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
“毛泽东集”二卷，365页。

……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做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摘自“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集”二卷，
377页。

……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

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 摘自“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二卷，552页。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

· 摘自“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三卷，933页。

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摘自“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

三卷，1063页。

.....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

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起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摘自“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1101頁——1102頁。

我們清醒地知道，在我們的前進道路上，還會有種種障礙，種種困難，我們應該準備對付一切內外敵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與掙扎。但是，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羣眾，緊緊地和羣眾一道，並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與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

摘自“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25日。

……雖然我們有一千多萬黨員，但是在全國人口中仍然只占極少數。在我們的各個國家機關和各項社會事業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黨外的人員來作。如果我們不善于依靠人民羣眾，不善于同黨外的人員合作，那就無法把工作做好。在我們繼續加強全黨的團結的時候，我們還必須繼續加強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必須認真地糾正在任何工作環節上的任何一種妨害黨同人民團結的不良現象。

摘自“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

1956年9月15日。

……現在全國農村中已經出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羣眾歡欣鼓舞。這件事給了一切共產黨人一個深刻的教訓：羣眾中蘊藏了這樣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為什麼在許多領導機關，

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沒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們所想的同广大羣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訓，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問題，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話，就是不要脫离羣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羣众的積極性。

摘自“所謂落后鄉村並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語，1955年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册56頁。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羣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羣众中的落后阶层奋起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技术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時間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沒有看见人民羣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

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

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羣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災、旱災問題，可能在几年之內获得解决。

摘自“應當使每人有一畝水地”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

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册206頁

正確對待羣衆運動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趣是一个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时间內，將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驟雨，迅猛异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压抑不住。他們將冲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们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决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头领导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評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对面反对他們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項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將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农民在乡里造反，攪动了紳士們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风雨的議論的压迫他閉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沒有法子否認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說：“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無論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認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广大的农民羣众起来完成他們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內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摘自“湖省农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一

卷，第13、16—17頁。

……我們的代表大會應該号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羣眾。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羣眾，細心地傾聽羣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裡的羣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羣眾之上，而是深入於羣眾之中；根據羣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羣眾的覺悟，在羣眾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羣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羣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羣眾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羣眾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羣眾是否已經了解並且是否願意行動起來，要到羣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羣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羣眾前進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還不了解的東西，羣眾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時候，廣大羣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羣眾的領導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後分子的意见，並且將這種落後分子的意见誤認為廣大羣眾的意见，做了落後分子的尾巴。總之，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羣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羣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摘自“論聯合政府”，1945年。“毛澤東選集”3卷，

1096—1097頁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羣眾運動的高高潮就要到

来。我們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搖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評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羣众运动的正确方針。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針，这是錯誤的方針。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極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們应当積極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帮助他們，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簡單地去进行斥责。簡單的斥责是不能解决問題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我們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積極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們应当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積極性。

在胜利面前，我認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錯誤，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錯誤，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屬於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

合作社吓昏了。

在发展的問題上，目前不是批評冒进的問題。說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羣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

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对。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决。但是，不应当將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們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計劃时期內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摘自“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第1——2、10、12、18、21頁）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來說可以在三年內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們（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羣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評），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們，請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罢！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許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嗎？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認输一法。羣众中蘊藏了一种極大的社会主义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們，对于这种積極性一概看不见。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

一片黑暗。他們有时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們遇見得还少嗎？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們，老是由于人民的積極性估計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現，他們总是不贊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認輸，做一点自我批評。第二种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現，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羣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羣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經驗，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們不妨試一試。

摘自“這個鄉兩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第587——588頁。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貧农和下中农羣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內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應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極大的憤怒斥責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貧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羣众，反而向羣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會議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烏烟瘴气，阴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戶的农民羣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編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

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咀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摘自“機會主義的邪氣垮下去，社會主義的正氣升上來”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729—730頁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讀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別要請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羣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積極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羣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羣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積極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許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問題上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將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積極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講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摘自“一個違背領導意願由羣衆自動辦起來的合作社”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1204頁

我們要反对那些所謂“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豪打击贫农阶级的錯誤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

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匪患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籠统地罵“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摘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泽东选集”一卷23—24页

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的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象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却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摘自：“在一九五九年二月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關於羣衆路線的工作方法問題

(一)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羣衆相結合。

(二)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羣衆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採用此種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和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发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員的政治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勤惰和工作優劣，並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地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借以取得經驗。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也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也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和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幹部都能學會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個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幹，並使這一領導骨幹和參加學習的廣大羣衆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羣衆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

果只有广大羣众的積極性，而无有力地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羣众的積極性，則羣众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羣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積極的、中間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須善于团结少数積極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凡屬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羣众的领导骨干，必須是从羣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羣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間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須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積極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許多地方和許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羣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員中、职員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積極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論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說建立领导核心問題，我們應該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羣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須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羣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领导，必須是从羣众中来，到羣众中去。这就是說，將羣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羣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羣众的意见，使羣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羣众行动中考驗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羣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羣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

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錯誤观点。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許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論。許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咀上、纸上或會議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須糾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須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許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許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訴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應該这样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这样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

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門都应当通过有关該項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們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門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門(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員去做,可以克服各單个部門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許多人变为積極参加該項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羣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該机关該学校的許多人、許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員、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員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羣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够完滿地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內,不能同时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須考虑到該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將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計劃,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亂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緩急地沒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員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羣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須注意解决的领导方

法問題。

(九) 领导方法問題上的各个细节問題，这里不一一說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說的原则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創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須随时拿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極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須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摘自“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1日，

“毛澤東選集”三卷，899頁。

沒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問題，也要在这次會議得到解决。因为同志們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許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許多工作人員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貿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們是亲自动員群众组织合作社、調剂 and 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貿易的实际工作人員，如果他們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們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計劃。因此，我要向同志們指出下面的几点：

第一，从组织上动員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債，发展合作社，調剂

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議事日程上面去討論，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羣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羣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羣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債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單位的羣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設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設的关系講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羣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講得十分实际。号召羣众购买公債，发展合作社，調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們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羣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羣众和宣传羣众，即是說，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設的工作去討論、检查，不注意推动羣众团体，不注意开羣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动员羣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設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極坏的傢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羣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們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象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債，不管羣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羣众不喜欢，公債不能好好地推销。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們要的是努力宣传，說服羣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羣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債，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經濟建設運動的開展，需要有很大數量的工作幹部。這不是幾十幾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幾千人幾萬人，要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送到經濟建設的陣地上去。他們是經濟戰綫上的指揮員，而廣大羣眾則是戰鬥員。人們常常嘆氣沒有幹部。同志們，真的沒有幹部嗎？從土地鬥爭、經濟鬥爭、革命戰爭中鍛鍊出來的羣眾，涌出來了無數的幹部，怎麼好說沒有幹部呢？丟掉錯誤的觀點，幹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經濟建設在今天不但和戰爭的總任務不能分離，和其他的任務也是不能分離的。只有深入查田運動，才能徹底消滅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發展農民的生產的積極性，使廣大農民迅速地走入經濟建設的戰綫上來。只有堅決地實行勞動法，才能改善工人羣眾的生活，使工人羣眾積極地迅速地參加經濟建設事業，而加強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只有正確地領導選舉運動和跟着查田運動的開展而開展的檢舉運動，才能健全我們的政府機關，使我們的政府更有力地領導革命戰爭，領導各方面的工作，領導經濟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羣眾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這對於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至於一天也不要忽略擴大紅軍的工作，那更不待說了。大家都明白，沒有紅軍的勝利，經濟封鎖就要更加厲害。另一方面，發展了國民經濟，改良了羣眾生活，無疑地就會極大地幫助擴大紅軍的工作，使廣大羣眾踊躍地開向前綫上去。總起來說，假如我們爭取了上述的一切條件，包括經濟建設這個新的極重要的條件，並且使這一切的條件都服務於革命戰爭，那末，革命戰爭的勝利，無疑是屬於我們的。

摘自“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20日，“毛澤東選集”一卷117—120頁

……共產黨員決不可脫離羣眾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于

不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必須注意組織先進分子和廣大羣眾之間的密切聯繫。這就是照顧多數的觀點。在一切有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產黨員必須採取和他們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度。那種壟斷專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必須善於照顧全局，善於照顧多數，並善於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我們過去在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點，必須注意改進。

摘自“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澤東選集”二卷，513—514頁。

凡是需要羣眾參加的工作，沒有羣眾的自覺與自願，就只會流於形式主義而失敗，“欲速則不達”，一切工作都是如此。

摘自“關於文化運動”，轉摘自田家英學習“為人民服務”，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54頁。

羣眾的意見與經驗一定要作為我們政策的基础。因為人民能交給我們許許多多的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並了解他們的經驗、願望、批評，確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總合，再作為政策交還給他們。

摘自毛主席“奧斯汀因談話”。

領導者的責任，就是不但指出鬥爭方向，規定鬥爭任務，而且必須總結具體的經驗，向羣眾迅速傳播這些經驗，使正確的獲得推廣，錯誤的不至重犯。

毛主席：“山西尊蘇土改報告批示”。

什么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沒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总得贊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来。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对于問題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問題的过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发现問題，提出問題，但是还不能解决問題。要解决問題，还須作系统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講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問題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問題。

摘自“反對黨入股”。1942年2月。“毛澤東選集”

三卷840頁。

現在我們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負指導工作，这是异常危險的現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沒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有的。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調查，調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

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們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識。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調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說，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識。我用开調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是一个“兴国調查”，一个“长岡乡調查”和一个“才溪乡調查”。开調查会，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調查和井冈山两县調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郎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門管錢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監獄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調查时該县的一个小獄吏。兴国調查和长岡、才溪两乡調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給他們当学生是必須恭謹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調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还必須自己口問手写，并問到会人展开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热忱，沒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羣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

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的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如此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摘自“‘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毛泽东选集”三卷，791页。

使党员注意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社会来源。

“古田會議決議”。轉摘自田家英：學習“為人民服務”。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94頁。

工作要實事求是地深入調查研究，按照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解決問題。

摘自毛主席：“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2月。

許多同志不去注意情況的變化，不去注意新事變的特點，以為事情還是和過去一樣，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過去階段，拿過去的观点來看新的事變，遺棄了新事變中所包藏的性質上的變化，因而不自覺的陷入了完全錯誤的境地。

“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諸問題”。轉摘自田家英：學習

“為人民服務”。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01頁。

……不在生產運動中實行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和廣大羣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別緩急輕重，爭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參加生產，培養幹部，激育羣眾，只知把生產任務推給建設廳長、供給部長、總務處長的觀點，是錯誤的。……

摘自“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1943年

10月1日，“毛澤東選集”三卷，915頁。

……又須首長負責，自己動手，實行領導骨幹和廣大羣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具體指導相結合的辦法，才能有效地推進生產工作。

摘自“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

“毛澤東選集”三卷，1018頁。

……我們的同志有了很多的進步。但是還須注意使我們的思想完全適合於我們所處的環境，然後才能使我們的工作樣樣見效，並迅速見效。如果我們真正了解了我們所處的環境是一個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農村根據地；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看起來收效很慢，並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實際上，比較那種不從這一點出發而從別一點出發，例如說，從城市觀點出發，其工作效果會怎樣呢？那就決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為，如果我們從後一點出發，脫離今天的實際情況，做起來不是效率快慢的問題，而是老碰釘子，根本沒有效果的問題。

摘自“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

“毛澤東選集”三卷，1015頁。

為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黨的幹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有許多的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例如：犯過錯誤，可以使人覺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錯誤的，從此萎靡不振；未犯錯誤，也可以使人覺得自己是未犯過錯誤的，從此驕傲起來。工作無成績，可以使人悲觀喪氣；工作有成績，又可以使人趾高氣揚。鬥爭歷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予責任；鬥爭歷史長的，可以因其長而自以為是。工農分子，可以自己的光榮出身傲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可以自己某些知識傲視工農分子。各種業務專長，都可以成為高傲自大輕視旁人的資本。

甚至年齡也可以成为驕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聰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經驗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覺性，那它們就会成为負擔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羣众，屢犯錯誤，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羣众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

摘自“學習和時間”，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951頁。

……凡屬人民羣众的正确意見，党必須依据情况領導羣众予以實現；而对于人民羣众中發生的不正確意見，則必須教育羣众予以改正。地書會議仅仅強調了党应当執行羣众意見的方面，而忽視了党应当教育羣众和領導羣众的方面，以致給了后来某些地区的工作同志犯尾巴主义錯誤以不正确的影响。

摘自毛主席“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

按照实际情况決定工作方針，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須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們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訓。

摘自毛主席“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

……河北省遵化县的经济，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們的办法就是学习。他們的口号是“書記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

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羣众办社”。……

……我們提出了“積極領導，穩步前進”，“全面規劃，加強領導”這樣一些口號，並且贊成遵化縣同志所提出來的“書記動手，全黨辦社”這個完全正確的口號。

……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已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摘自“書記動手，全黨辦社”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3頁

總之，領導不應當落在羣眾運動的後頭。而現在的情況正是羣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領導趕不上運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只要我們黨對於處理合作化問題上的各項政策是正確的，只要我們黨當著發動羣眾加入合作社的時候所採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義的或者簡單從事的方法，而是向羣眾講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羣眾自覺自願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並且達到增產，決不是很困難的。……

摘自“只化一個多月時間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44頁

羣眾中蘊藏了這樣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為什麼在許多領導機關，在幾個月以前，居然沒有感覺到，或者感覺的那樣少呢？領導者們所想的同廣大羣眾所想的，為什麼那樣不一致

呢？以此為教訓，那末，今後對於有相似情況的事件和問題，應當怎樣處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話，就是不要脫離羣眾，要善於從本質上發現羣眾的積極性。

摘自“所謂落後鄉村並非一切都落後”。一文按語，1955年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56頁

……問題是要全面規劃，要加強領導。我們要求每個縣委書記都學陽高縣委書記那樣，用心尋找當地羣眾中的先進經驗，加以總結，使之推廣。

摘自“看，大泉山變了樣子！”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227頁

……毛主席特別強調部署各項工作必須通過羣眾鳴放爭辯，他說，計劃、指標不經過羣眾討論，主意是你們的；辯論後，羣眾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毛主席還一再強調領導必須多到下面去看，幫助基層幹部總結經驗，就地進行指導。……

· 摘自：毛主席視察山東並作重要指示。（新聞報導）

毛主席對本社記者說，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羣眾很大的干劲，在這個基礎上各項任務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應當完成鋼鐵戰綫上的任務。在鋼鐵戰綫上，廣大羣眾已經發動起來了。但是就全國來說，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業，對於發動羣眾的工作還沒有做好，沒有開羣眾大會，沒有將任務、理由和方法，向羣眾講得清清楚楚，並在羣眾中展開辯論。到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同志不願意在工業方面搞大規模的羣眾運動，他們把在工業戰綫上搞羣眾運動，說成是不正規，貶之為“農村作風”

“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摘自：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新聞報導）

他（毛主席——編者注）指示說：“发展鋼鐵工业一定要搞羣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羣众运动，沒有羣众运动是不行的。”

摘自：毛主席在安徽。

（以上三段引文，摘自本院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習文件，142、146、150頁）

(二) 关于理論联系实际问题

理論來源於实践。革命的理論 是行動的指南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对社会实践的依賴关系，即認識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賴关系。

首先，馬克思主义者認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識，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員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員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問題。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員，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問題。这是人的認識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認識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馬克思主义者認為人類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剝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認識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

馬克思主义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会实践，才是人們对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践过程中），人們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們的認識才被証实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中失败。人們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們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謂“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虧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認实践重要性、使認識离开实践的錯誤理論。列宁这样說过：“实践高于（理論的）認識，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唯物論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辯証唯物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強調理論对于实践的依賴关系，理論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辯証唯物

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列宁說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臆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馬克思列宁主义認為：認識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認識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認識表现为理論的，但在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認識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們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們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問題，理論才解决本质問題。这些問題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無論何人要認識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沒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認識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認識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来到，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沒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話，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才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实践中間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

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这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瞭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

一个所謂“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們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識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馬克思主义的理論，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剝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們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認識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籠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認識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認識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我們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們是一些沒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們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們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們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說出来的一句话：沒有把握。为什么沒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沒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沒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談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詳細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

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說，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留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

的錯誤，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將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须从感性認識跃进到理性認識。这种改造过的認識，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者不是这样，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轻理論，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針，沒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認識，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学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历史性或辯證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全体上則都是錯誤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运动，对于一个小小的認識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認識）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認識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認識）也是如此。

然而認識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認識为止，那末还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說来，还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义看来，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說过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

論，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馬克思主义看重理論，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阵，束之高閣，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义的。認識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論的認識，还須再回到实践去。認識的能动作，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須表现于从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檢驗理論和发展理論的过程，是整个認識过程的继续。理論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問題，在前面說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运动中是沒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論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預想的目的。許多自然科学理論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們創立这些学說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証实的时候。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說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証实的时候。辯証唯物論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無論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認識的历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檢驗而纠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经过实践的檢驗而纠正其錯誤。所謂实践是真理的標準，所謂“生活、实践底观点，應該是認識論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說很好：“理論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論；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論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摘自“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一卷。

281—286頁。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系，就不知道那件事情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就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

不允許任何的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這些人的理由是：蘇聯的戰爭是革命的戰爭，我們的戰爭也是革命的戰爭，而且蘇聯是勝利了，為什麼還有取捨的余地？他們不知道：我們固然應該特別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因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戰爭的經驗，是在列寧、斯大林指導之下獲得的；但是我們還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因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況。

再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就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它，具體地說，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和奪取大城市。他們不知道：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是不應該刻板地抄用，因為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只應該採用北伐戰爭中那些在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東西。

由此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着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

摘自“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

澤東選集”一卷，167—170頁

……如果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变化的行程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而不能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之以调节整理，造出为战争所必需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晓得抗日战争的规律性，才能实现对于他的战略指导，才能决定为战争服役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计划与方案。

摘自“論新階段”。

……延安的青年們干了些什么呢？他們在学习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沒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問如何种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学过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論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講。只有我們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們根本不同，他們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鋒，因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說，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摘自“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澤東選集”

二卷，556頁

中国共产党的廿年，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

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日戰爭以來，我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戰爭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中國歷史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據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结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象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和國際的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對於國內和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的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夸夸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卻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和少數黨的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依据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环境的任务。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軍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結論。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們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夸夸其談地乱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們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們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摘自“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毛澤東選集”

三卷，802——815頁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証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說过，脱离实际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确的，應該拋棄的。对于好談这种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証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論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摘自“整頓黨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819頁。

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的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 and 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

……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摘自“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一卷96—97页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摘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毛泽东选集”一卷112页。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采用，丝毫不变更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一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

們固然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是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又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着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和蘇聯軍事機關頒布的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着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的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這些人的理由是：蘇聯的戰爭是革命的戰爭，我們的戰爭也是革命的戰爭，而且蘇聯是勝利了，為什麼還有取捨的余地？他們不知道：我們固然應該特別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因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戰爭的經驗，是在列寧、斯大林指導之下獲得的；但是我們還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因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況。

再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就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它，具體地說，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和奪取大城市。他們不知道：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是不應該刻板地抄用，因為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只應該採用北伐戰爭中那些在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東西。

由此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着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我們研究

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

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摘自“中国革命战争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一卷169—171、185—186頁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說：誘敌深入是不对的，放棄了許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嗎？并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嗎？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的地方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嗎？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軍和大軍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綫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钵钵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誰不承認这些，就给以懲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論和实际都是錯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魯莽家和門外汉的理論和实际，是絲毫也没有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馬克思主义的东西。

摘自“中国革命战争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一卷205—205頁。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義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這一點，我在“實踐論”一文中已經說過了。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了解中國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產黨一方、不了解國民黨一方，只了解無產階級一方、不了解資產階級一方，只了解農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順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難情形一方，只了解過去一方、不了解將來一方，只了解個體一方、不了解總體一方，只了解缺點一方、不了解成績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開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話，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的，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這樣，是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務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確地發展黨內的思想鬥爭的。孫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入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家營盤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我們應該記得他的話。表面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里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裡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

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問題、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沒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錯誤，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們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認識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的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須注意。”

摘自“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

一卷300——302頁

……我們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將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們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們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响导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們也反对“左”翼空談主义。他們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論和机械唯物論，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認識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論，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

錯誤思想。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們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对的眞理性。无数相对的眞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眞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滿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認識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滿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辯証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認識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認識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对于客观现实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沒有完结，人們在实践中对于眞理的認識也就永远沒有完结。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眞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观和客观、理論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統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摘自“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一卷，
284頁。

……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經驗，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对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沒有統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沒有能够在这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綫和组织路綫。

摘自“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選集”二卷，578頁。

其次說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經驗，学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

遍真理。許多同志的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單純的学习。所以虽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詞句，而不会运用他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問題和解决中国革命問題。这种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

我們学的是馬克思主义，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学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說，他們违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論和实际统一。他們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論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邏輯，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諸如此类。其结果，謬种流传，誤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酈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許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問題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說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

为了反复地說明这个意思，我想將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講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單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

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盲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單純地学理論而去学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們說：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規律，作为我們行动的响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們的許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們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許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單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視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講演，即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譁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目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飞。这就是我們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导革命，則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們应当說，沒有科学的态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說：

牆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間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沒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对于徒有虛名并无实学的人，你們看，象不象？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記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牆壁上。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學問，任何一点調度都是不行的。我們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自“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毛澤東選集”三卷，799頁。

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們要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謂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問題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問題，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問題。既然是这样，学风問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个重要的問題。

現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論家，什么是知識分子，什么是理論和实际联系等等問題的糊涂观念。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党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近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党的理論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內容來說，理論战綫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論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說來，我們的理論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們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論程度。我們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

使之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经济、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可以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是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理論書。象在中國經濟問題方面，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象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論家呢？不能這樣說。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我們如果僅僅讀了他們的著作，但是沒有進一步地根據他們的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沒有企圖在理論上來思考中國的革命實踐，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只能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的結論和個別的原理，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綫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一個人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呢？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怎樣的人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夠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真正領會列寧斯大林關於殖民地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學說，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发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我們黨的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

.....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一種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識，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

.....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结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但是，在這種兩種主觀主義中，現在在我們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為危險。因為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吓唬工農幹部，把他們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也可以吓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事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和經驗結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產生一些真正的理

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們的經驗上升成為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證法。但是我們黨內還有許多同志，他們並不注重宣傳唯物主義，也不注重宣傳辯證法。有些同志聽憑別人宣傳主觀主義，也安之若素。這些同志自以為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卻不努力宣傳唯物主義，聽了或看了主觀主義的東西也不想一想，也不發議論。這種態度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這使得我們許多同志蒙受了主觀主義思想的毒害，發生麻木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在黨內發動一個啟蒙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號召同志們對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加以抵制。這些東西好像日貨，因為只有我們的敵人願意我們保存這些壞東西，使我們繼續受蒙蔽，所以我們應該提倡抵制，就象抵制日貨一樣。一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貨色，我們都要抵制，使它們在市場上銷售困難，不要讓它們利用黨內理論水平低，出賣自己那一套。為此目的，就要同志們提高嗅覺，就要同志們對於任何東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鑑別其好壞，然後才決定歡迎它，或者抵制它。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摘自：“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毛澤東選集”

三卷，835—849頁。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

小资产阶级成份極其广大的国家，我們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們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摘自“反对黨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831頁。

……对于任何問題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會議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綫問題，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对蔣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紅軍斗争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当时的錯誤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們一致的。列宁說，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摘自“學習和時間”，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942頁。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錯誤，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們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的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訓。

摘自“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

堅持理論聯系实际的方針

一切带原则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經驗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該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經驗中考証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絕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們就不能指导战争。

讀書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軍人之間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的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說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說学得彻底，用得純熟不容易。說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軍人，是說此門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摘自“中國革命战争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

澤東選集”一卷，178—179頁。

一般地說，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較低的党员。特殊地說，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員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論，没有历史知識，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論。不应当把他們的理論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詞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學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們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应当学习他們观察問題和解决問題的立场和方法。我們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們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的任务，对于我們，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須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問題。我希望从我們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誰真正地学习到了一点东西，看誰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責任的观点上說，如果我們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們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学习我們的历史遗产，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們学习的另一任务。我們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对于这些，我們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們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們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們应

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談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須解决的問題。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調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問題上，我們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錯誤，是应该認真地克服的。

摘自“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澤東選集”二卷，521——523頁

两軍敌对的一切問題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軍事的理論，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軍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緩。战术的研究虽然不足，但十年来从事軍事工作的同志們已有很多的成绩，已有很多根据中国条件而提出的新东西，缺点在于沒有总结起来。战略問題和战争理論問題的研究，至今只限于極少数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其經驗之丰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們了，但缺点在于綜合性和系統性的不足。为

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軍事知識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必要的。

摘自“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毛泽东选集”二卷542页。

第二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这种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談的濫翻文章而是科学的結論。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譁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論和实际统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碼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

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問題为中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廢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摘自：“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毛澤東選集”，三卷，821—823頁。

除了对于“理論家”和“知識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和实际联系”，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們天天講“联系”，实际上却是講“隔离”，因为他們并不去联系。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来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讚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鑑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問題不講明白，我們党的理論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学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書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們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將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說，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經反复地講，我們的学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記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話。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們善于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說，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講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講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們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

我們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說明一个两个实际問題，那就要受到称讚，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說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現在我們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

什么是知識？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識只有两門，一門叫做生产斗争知識，一門叫做阶级斗争知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門知識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结，此外有什么知識呢？沒有

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同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里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那樣的小學一直讀到那樣的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沒有參加任何實際活動，還沒有把自己學得的知識應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門里去。象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因為他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況說來，這種知識對於他們還是片面性的，這種知識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最重要的，是善於將這些知識應用到生活和實際中去。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些。

有什麼辦法使這種僅有書本知識的人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摘自：“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三卷，837—838、841—842頁。

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

摘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1942年5月23日，

“毛澤東選集”三卷，854頁。

(三) 关于批評和自我 批評問題

有无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們曾經說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枢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对于我們，经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們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嗎？难道我們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沾污我們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体嗎？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难过，难道我們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

嗎？

摘自“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1097——1098頁。

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的生產也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基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坐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劣的官僚主義灰塵和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為了清潔，為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

摘自“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938頁

最後，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一個發了闌尾炎，醫生把闌尾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志。這

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魯莽的态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摘自“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三卷，829——830頁

……为了巩固工农专政，苏维埃必須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的工作监督与批評。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員的錯誤和缺点之权。……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摘自“蘇維埃中國”，1957年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翻印本262頁。

因为我們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对，我們就改正。你說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們就照你的办。“精兵簡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們就采用了。只要我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摘自：“為人民服務”，1944年9月8日，“毛澤東選集”三卷，1003頁。

发动地方党对紅軍党的批評和羣众政权机关对紅軍的批評，以影响紅軍的党和紅軍官兵。

.....

非组织的批評：

党内批評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評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毀坏了个人，也毀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糾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評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評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許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評而在党外去批評，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議等）的重要，以为批評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別。糾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評应当在党的会議上提出。

.....

.....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評，不要証据的乱說，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糾紛，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評問題，还有一点要說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評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們不明白批評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和组织上的錯誤。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錯誤有联系，则不必多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評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注意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要忘記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險。

.....

党内批評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証据，批評要注意政治。

.....

.....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評，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罵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議上說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議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

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摘自“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一卷，92—97页。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不是積極地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這是第二種。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這是第三種。

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這是第四種。

不是為了團結，為了進步，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和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洩私憤，圖報復。這是第五種。

听了不正确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

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摘自“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

二卷，347--348页

……今后，我们准备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整风运动，运动时间可以大为缩短，作为解决我国整个过渡时期各项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法。实行这个方法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必须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会站在我们方面的，是讲道理的这一点已为运动的全部经验所证明。

我们根据列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得出了整风的方法，而目前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又一次说明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

摘自“毛泽东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6日

(四) 关于团结問題

大会中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经过說明已經歸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綫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綫之間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表示了我們的党已經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摘自“為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斗争”

1937年5月7日，“毛澤東選集”一卷，268

——269頁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爭取抗日胜利和建設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经过了十七年鍛煉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許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这样，我們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爭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設一个新中国。同志們，只要我們能团结，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摘自：“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澤東選集”二卷，523頁。

……我們要把我們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紀律的原則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論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

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決議的，我們就要和他团结。我們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們有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們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經驗，采取謙遜态度，防止驕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証，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們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設起来。

摘自“被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1098頁

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蝕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羣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們

贊成馬克思主義，但是不準備實行之，或不準備完全實行之，不準備拿馬克思主義代替自己的自由主義；這些人，馬克思主義是有的，自由主義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兩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途。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着援助敵人的作用，因此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 and 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羣眾的聯繫；關心黨和羣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

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的傾向，使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面來。這是思想戰綫的任務之一。

摘自“反對自由主義”1937年9月7日，“毛澤東選集”

二卷，347—349頁

由於二十年的鍛煉，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占統治地位的宗派主義了。但是宗派主義殘余還是存在的，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余，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殘余。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剷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能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和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

行无阻。

……應該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們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調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整頓党的作风，必須彻底地解决这个問題。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們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内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摘自：“整頓黨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

822——830頁。

……中央認為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时应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錯誤路綫和李立三錯誤路綫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錯誤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錯誤的詳細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們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問題，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

的責任方面，而應着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兴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摘自：“學習和時間”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941—942頁。

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繫起來，這是我們黨的的一貫的思想原則。許多年來，特別是從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以來，我們在加強黨內的馬克思列寧的教育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現在，比起整風運動以前，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已經提高了一步。但是我們還有嚴重的缺點。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着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羣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於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志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

摘自“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56年9月。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條主義者和廣大黨員羣眾之間的矛盾，教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左’傾教條主義者從前採用的黨內鬥爭方法叫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是一個錯誤的方法。我們在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就沒有採取這個老方法，而採取了一個新方法。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風的時候採用的。經過幾年之後，到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果然達到了全黨團結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勝利。在這裡，首先需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因為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的願望，一鬥勢必把事情鬥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還有什麼黨的團結？從這個經驗里，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或者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我們把這個方法推廣到了黨外。在各抗日根據地，我們處理領導和羣眾的關係，處理軍民關係、官兵關係，幾部分軍隊之間的關係、幾部分幹部之間的關係，都採用了這個方法，並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這個問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可以追溯到更遠。自從一九二七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開始，關於處理黨羣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以及其他人民內部關係，就是採用這個方法的。不過到了抗日時期，我們把這個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覺的基礎上了。全國解放以後，我們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也採取了‘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我們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

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摘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

必須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先进分子与积极分子，我們必須和他們协同工作。那种“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們，看不起他們，而是尊重他們，亲近他們，团结他們，說服他們，鼓励他們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錯誤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过，棄旧图新。

摘自：“論新階段”。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單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須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种不是說，我們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羣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沒有了宗派主义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們的許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視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讀了几本馬克思主义的書籍之后，不是更謙虛，而是更驕傲了，总是說人家不行，

而不知自己实在一知半解。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條真理：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相比較，無論何時都是占少數。假定一百個人中有一個共產黨員，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中就有四百五十萬共產黨員。即使達到這樣大的數目，共產黨員也還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和非黨人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卻不懂得這個道理，看不起願意同我們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相反地，他們總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聯繫羣眾，而不要脫離羣眾。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樣根據嗎？沒有。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個決議說是我們可以脫離羣眾使自己孤立起來。相反地，中央總是叫我們密切聯繫羣眾，而不要脫離羣眾。所以，一切脫離羣眾的行為，並沒有任何的根據，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來的宗派主義思想在那裡作怪。因為這種宗派主義在一部分同志中還很嚴重，還在障礙黨的路綫的實行，所以我們要針對這個問題在黨內進行廣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們的幹部真正懂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們懂得共產黨員如果不同黨外幹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

一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都和革命的實際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對宗派主義和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應當同時並進。

摘自：“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

三卷，827。

……目前在我們黨內嚴重地存在着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門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間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說服同志們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間的思想，提倡同志間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們当前的重要任务。

摘自：“學習和時間”，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選集”三卷，944頁。

(五) 关于民主作风問題

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

摘自“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一卷，75页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摘自“反对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一卷，91页

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和內戰時期，集中制表現得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於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幹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餘，團結全黨象鋼鐵一樣。

摘自“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1937年5月7日，“毛澤東選集”一卷，
268頁。

民主和集中之間，並沒有不可越過的深溝，對於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這個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國廣大人民羣衆的支持和擁護，人民也一定要能夠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這就是民主制的意義。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當人民要求的政策已經通過民意機關而交付與自己選舉的政府的時候，即由政府去執行，只要執行時不違背曾經民意通過的方針，其執行必能順利無阻。這就是集中制的意義。只有採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別強大，抗日戰爭中國防性質的政府必定要採取這種民主集中制。

……政府和人民在戰爭中的不一致，就產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絕對集中主義的政府。可是歷史上還有革命的戰爭，例如法國的革命戰爭、俄國的革命戰爭、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戰爭。在這一類的戰爭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贊成戰爭，因為人民極願意進行這種戰爭；政府的基本建設在人民的自願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懼怕人民，而且必須喚起人民，引導人民發表意見，以便積極地參加戰爭。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戰爭的進行沒有人民參加又是不能勝利的，因此民主

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摘自“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1937年10月25日，
“毛澤東選集”二卷，374頁。

鉴于张国燾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須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誰破坏了这些纪律，誰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經驗証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們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燾，則利用許多黨員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須对黨員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燾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軌，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須制定一种较詳細的党内法規，以统一各級领导机关的行动。

摘自“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澤東選集”二卷，516頁。

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剝削阶级剝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劳动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沒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許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

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层建筑，屬於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說，归根結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們不应当片面地強調某一个側面而否定另一个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纪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这种民主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須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約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羣众是懂得的。

我們主張有领导的自由，主張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說，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的辨別問題，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

摘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6月，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5頁——6頁。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謂发挥积极性，必須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創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发表意見、批評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沒有这些，所謂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賴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創造，也只有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們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

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泽东选集”二卷，517页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费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分。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

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摘自“井崗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一卷，67—70頁

八路軍有一種極其重要和極其顯著的东西，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有三個，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這就是在軍隊中肅清封建主義，廢除打罵制度，建立自覺紀律，實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團結一致的。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辦法雖然目前收效尚未顯著，但在將來必定會有成效的。此外，從第二個原則出發，八路軍的補充不採取強迫人民的方式，而採取鼓勵人民上前綫的方式，這個辦法較之強迫的辦法收效大得多。

摘自“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選集”二卷，369頁。

四軍黨內存在着的非組織的觀點，其表現如下：

甲、少數不服從多數。例如少數人的提議被否決，他們就不誠意地執行黨的決議。

糾正的方法：

(一)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盡量發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一次不能解決的，二次再議（以不妨礙工作為條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結論。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摘自“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一卷，92页

此外，在我们的军队工作中，还存在着一种军阀主义作风，这也是一种国民党的作风，因为国民党是脱离群众的。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但是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又经过今年春节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这个倾向是根本地克服下去了，还有一些残余，还必须继续克服。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内，这种毛病都是有的，那里的党和军队必须注意克服这种毛病。

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

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果我们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去掉军阀主义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会顺利地展开，生产运动当然也是这样。

摘自“想識起來”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講集”

三卷，937—938頁。

(十四) 我們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極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員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們的批評討論，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們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們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們解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区别的。但是，我們队伍中确有許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傳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別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見，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維話，不爱听批評話。为怕碰釘子，受打击，遭报复，人們不敢大胆提意見。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礙着我們事业的进步，也阻礙着工作人員的进步。我提議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論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惡意攻击，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員，有责任听別人的話。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聞者足戒。如果沒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們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贊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們仍有严重缺点，我們許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們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职位高低，都是

人民的勤勞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麼不好的東西捨不得丟掉呢？如果我們改正了這個缺點，那我們就能團結更廣大人民，我們的事業就能獲得更大的與更快的發展。

摘自：“一九四五年的任務”，解放日報1944年12月16日一版。

要在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反對官僚主義。現在在不少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中存在着很嚴重的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發生和滋長，是與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分不開的。即以中央一級機關來說，許多部門中的許多領導幹部，還僅僅滿足於坐在機關中寫決議，發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層去了解情況和檢查工作，使自己的領導常常脫離羣眾和脫離實際，以致在工作中發生了不少的嚴重問題。我們要进行大規模的國家建設，就必須克服官僚主義，密切聯繫人民羣眾。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幹部都應該經常深入下層，檢查工作。如果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克服了官僚主義，下面那些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現象，也一定會得到克服的。這些毛病都去掉了，我們的國家計劃建設就一定會成功，人民民主制度就一定會發展，帝國主義的陰謀就一定會失敗，我們就一定能夠取得完全的勝利！

摘自“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的指示”，1953年2月7日。

蘇維埃的基本任務是革命戰爭，是動員一切民眾力量去進行戰爭。環繞這個基本任務，蘇維埃就有著許多迫切的任務。他應該對廣大的民眾施行廣泛的民主。……

蘇維埃政權需要使強力去對付一切階級敵人，但對於自己的階級——工人、農民、職員、革命知識分子等大多數民眾，則不能使用強力，而他表現出來的只是最寬泛的民主主義。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摘自：“蘇維埃中國”，1957年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翻印本，258頁、259頁。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是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給予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结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摘自：“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匯編”第一編（上），第101頁。

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加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並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

的方法同他們进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摘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開幕詞”，1950年6月23日。

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這同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為着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而發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

全國解放以後，我們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也採取了“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機關、團體，總之，六億人口，都採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

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摘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6至9页。

(六)关于学习問題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須从不自滿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誨人不倦”，我們应取这种态度。

摘自“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澤東選集”二卷，523頁。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問拿在講堂上，或在書本中，很多人儒管講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們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摘自“中國革命战争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一卷，171頁。

讀書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軍人之間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說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說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說老百姓

很快可以变成軍人，是說此門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摘自“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一卷，174——175頁。

研究學問的時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當着我們剛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之間，互相矛盾着。然而由於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為知之甚多，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為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摘自“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一卷，313頁。

共產黨員又應成為學習的模範，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只有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於工作實事求是，對於前途有遠見卓識。

摘自“論新階段”。

一個革命幹部，必須能看能寫，又有豐富的社会常識與自然常識，以為從事工作的基礎與學習理論的基礎，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也才有學好的希望。沒有這個基礎，就是說不識字，不能看，不能寫，其社会常識與自然常識限于直接見聞的範圍，這樣的人雖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雖然也能學到某些道理，但要學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文化課本”序（延安版）。轉錄自：毛澤東同志論教育

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

1、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

2、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3、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

4、是一种长期大学校。

5、每日二小时学习制。

6、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7、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学习一致。

8、勤学者奖，怠惰者罚。

9、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的机关与人员。

摘自“反投降提纲”16页，1939年6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摘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譬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

西正在强迫我們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們办不好经济。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败。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們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們的失败。但是联共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們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設。他們已经建設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联共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們有利，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摘自“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7月，“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匯編”第一輯(上)，107頁。

解放区的工作人員，必須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須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軍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須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驅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們的工作人員，必須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摘自“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毛澤東選集”三卷1092頁。

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剝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

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須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摘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6月，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20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們学习，同时号召你們，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們，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驕傲自滿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們的光荣称号。

摘自“在全國戰鬥英雄勞動模範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主席代表
中共中央致祝詞”1950年9月25日。

我现在 还痛感 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全和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羣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的志愿。

摘自“‘農村調查’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毛澤東選集”三卷，791頁。

……我們必須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們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創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沒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 and 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

的創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摘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三卷，862頁。

……中国應該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們对于食物一样，必須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洩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們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剝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錯誤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須將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說，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創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

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讚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摘自“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三卷，
700——701页。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1954年9月15日。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

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們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伟大的成绩，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应当永远記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摘自：“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

1956年9月15日。

1953年2月7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作了重要指示。他在其中說：

“我們要進行伟大的国家建設，我們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够的，因此，要認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經驗。无论共产党內、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羣众和农民羣众，都必须誠心誠意地向苏联学习。我們不仅要学习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們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国家。”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扩大會議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他在講演的最后部分說：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們必須認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經驗。苏联建設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对于我們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給我們沒有？英国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們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給了我們一些帮助。完全不錯，一切国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

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

同年4月17日，毛主席在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我国的宴会上讲话中说：

“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世界劳动人民的巨大财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和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从苏联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今后，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加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同年11月6日，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摘自“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毛泽东选集”三卷

1084页。

(七)关于勤俭办一切事业問題

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摘自“勤俭办社”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16页。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

部門中認真地推行，也沒有在一般機關、部隊、學校、人民團體中認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國各方面提倡節約，反對浪費。我們對建設工作還缺乏經驗。在過去幾年有很大的成績，同時也有浪費。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的企業以為骨幹，沒有這個骨幹就不能使我國在幾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是多數企業不應當這樣做，應當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並且應當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會更着重地提出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方針以後，幾個月以來已經開始發生效果。這一次節約運動必須徹底地持久地進行的反對浪費，同批判其他缺點錯誤一樣，好比洗臉。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臉嗎？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總之，我們六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着一種不願意和羣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構，下放幹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幹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摘自“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6月，人民出

版社單行本，35——36頁

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鬥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後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着戰爭和

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国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摘自“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选集”，一卷131页。

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转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327页。

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

摘自“论新阶段”。

我们要一方面征粮产粮，一方面力求节省；来保证粮食的完全无虞。这是领导同志的工作，又是一个群众运动。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

范的条件之一。

摘自“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選集”三卷，914頁。

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時，必須十分愛惜當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長期打算，避免濫用和浪費。這不但是為着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是為着建設新中國。

摘自“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毛澤東選集”三卷，1092頁。

在這裡，有一點還須引起我們前方同志的注意。我們有些地區開闢不久，還頗富足，但是那裏的工作人員自恃富足，不肯節省，也不肯生產。這樣就很不好，他們在將來一定會要吃虧的。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的很多年，計算到長期堅持戰爭，計算到反攻，計算到趕走敵人之後的建設。一面決不濫用浪費，一面努力發展生產。過去有些地方缺少長期打算，既未注意節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發展生產吃了大虧。得了這個教訓，現在必須引起注意。

摘自“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澤東選集”三卷，1018頁。

這次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以後，我們就要實行“精兵簡政”。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這

五項，對於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關係極大。精簡之後減少了消費性的支出，增加了生產的收入，不但直接給予財政以好影響，而且可以減少人民的負擔，影響人民的經濟。經濟和財政工作機構中的不統一、關獨立性、各自為政等惡劣現象必須克服，而建立統一的、指揮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貫徹到底的工作系統。這種統一的系統建立後，工作效能就可增加節約是一切工作機關都要注意的，經濟和財政工作機關尤其要注意。實行節約的結果，可以節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費性的支出，其數目可以達到幾千萬元。從事經濟和財政業務的工作人員，還必須克服存在的有些還是很嚴重的官僚主義，例如貪污現象，擺空架子，無益的“正規化”，文牘主義等等。如果我們把五項要求在黨的、政府的、軍隊的各個系統中完全實行起來，那我們的這次精兵簡政，就算達到了目的，我們的困難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們會要“場台”的人們的咀巴也就可以被我們封住了。

摘自“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毛澤東選集”
三卷，897頁。

為了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及市鎮上的工業生產，在消滅封建制度的鬥爭中，必須注意盡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採取辦法堅決地反對任何人對於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破壞和浪費，反對大吃大喝，注意節約。

摘自“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
華北新華書店印行單行本，12頁。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
(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了。

摘自“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摘自“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招待会上的讲话”。

1952年1月2日“人民日报”。

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是这样。在这方面，必须进行许多工作。

摘自“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

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768页。

遼化区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日
贫农只有三条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
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
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难道六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
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
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
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
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类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摘自“書記動手，全黨辦社”一文接語，“中國農村的社
會主義高潮”上册，5—6頁。

这里說的是李順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这个合
作社办了三年，变成了一个包括二百八十三户的大社。这个社
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
三年功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劳动力的利用率，比抗日以前
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比建社以前的互
助组时期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四。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已经由第
一年的一百二十元，增加到一万一千多元。一九五五年社員每
人平均收入粮食八百八十四斤，比抗日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七，比建社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这个社已经作了一个
五年计划，实行三年的结果，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五年计划的
百分之一百零点六。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
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
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摘自“勤儉辦社，建設山區”一文接語，“中國農村的社
會主義高潮”上册，101頁。

刘玉如领导的这个合作社，同河北省的王国藩合作社相似，都是因为穷，被人看不起，经过刻苦奋斗，终于战胜了困难的。各省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应当广为传播，鼓励大家。

摘自“一个被人讥笑的穷合作社”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437页。